

“南水北调”的文学记录

——评长篇报告文学《美丽中国样本》 □李炳银

水，乃人的命脉所系。没有了水，人类以至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活动都将无从谈起。

可是，中国的华北、中原等很多北方地区，如今严重缺水。“北京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却没有水用；华北平原如今因为过量抽取地下水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区；山东、河南等地区严重缺水，人们的生活和发展局势因缺水而变得非常严峻。历史上，北方其实并不缺水，《吕氏春秋》中说“河出孟津，大溢遂流”，可以说，华北平原、中原厚土、山东平原，都是因河而来。这是河之患，亦是河之利。但在这患利的表现过程中，却明白地说明着水量丰富的信息。可是，如今河细断流，丰水不再，大地干渴，人困于水。是人阻断了河流，还是河流抛弃了人类。这是个问题，实在需要叩问和面对。

北方缺水。为了生存发展，无奈之下只有从南方设法调水。于是，有了看似激情豪迈的设想和主张，有了改天换地的壮烈行动，一个再造江河——“南水北调”的宏伟工程开始实施建设。其中线、东线已经接近完成，“南水北调”即将部分地成为现实。作家喬兆宏的长篇报告文学《美丽中国样本》，就是在真实的接触面对过程中，对“南水北调”工程从提起的缘由和具体的实施过程的文学表现。从她的接触范围看来，这是迄今全面和内情客观地报告这个宏大工程的文本，亦可以说，喬兆宏用文学的笔墨为“南水北调”工程写下了一本可资参照记忆的真实史志作品。

像《美丽中国样本》这样的事件报告，对于文学家的要求和困厄都是明显和强烈的。在这里，作家已经失去了自由选择驰骋的可能，对象和目标是已经设定的，这就排他地决定了作家的写作方向和基本的叙述过程。因此，作家必须有才能和方法在有限的范围内将自己的本领功夫给予释放，让自己面对的对象以文学的形态得到很好地展示和表现。面对“南水北调”这个信息内容浩如烟海的对象，喬兆宏摆脱了可能走向因堆砌资料而卷轶浩繁的歧途，在总共“九章”主体叙述和“引子”、“后记”的线性布局结构与组团呈现下，很清晰简练地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水环境情形给予描述，将过去中国一些相关“治水”的情形，如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等

给予了适当的引入，将工程中如勘测、施工、移民、水患、治污、纷争、用度等等相关内容纠合到一起，系统而分别有重点地进行报告，最终使书写对象的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原貌毕现。这种统摄全局、重点把握的驾驭手段，使得这部作品全面丰富而不臃肿，过程迁移自然而信息情节丰富，有气势，有故事人物内容，有工程进展情形，也有人的情感命运窘困局面和或高尚或丑陋或无奈的行为选择，林林总总，厚重丰满。

喬兆宏以其艰辛的采访和历史现实的追踪，向读者提供的大量相关信息及内情故事，令人得益多多，感受深刻。对北方缺水的严峻局面，其描述介绍就非常令人开阔眼界和深感震惊，像北京的21条管线全部断流，像天津原本有140多亿立方米的水入海，可现在却因缺水导致地面沉降2米多等这样的严峻局面，未必是所有人都了解的，但却与所有的中国人都相关。对于作品，这些内容是必要的部分，作为“南水北调”工程，这是最原始和基本的根源。所以，北方缺水，大地在干枯，生态在恶化，生存危机就在当下，这些内容自然成了作家最早关注的部分。这些内容既是调水的背景，也是说明调水必须与无奈的必要方式。在进入工程的实施阶段之后，作品即开始有重点地对决策、选线过程及需要面对的许多问题展开叙述。作品最多涉及的是如何解决预防水源地和输水过程中保证水质的问题，因而对水源地和沿途很多存在的可怕污染情形及其根源管控治理行为做了真实充分的报告。如汉江流域对“黄姜”污染的管控，湖北、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对其境内河湖污染可能对输水造成威胁的防治治理情况等。在这所有的过程中，都时时存在着个人、局部和大局之间的利害、牺牲与奉献、崇高与卑劣、权利与义务等等矛盾问题，而恰恰是在许多的矛盾中，作家发现并用事实加以表现，以人物选择故事，将对象给予文学的描写和价值的褒贬，具有形而上的激情力量。像一位“淮河赤子”的抗争”一节中对霍岳珊多年关注淮河污染形势和自发抗争，他不顾被人监视、窃听、威胁以至打骂而不放弃斗争的情形描写，就使人感慨和沉思。江苏的扬州等地在处理“加快沿江开发”和保证调水质量的矛盾过程中科学决策的情形，陕西、湖北、山东、河南相关地区放弃矿山开发，关闭化工、

造纸等容易造成污染的企业，承担沉重的移民搬迁任务等，都是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维护大局的精神，在非常矛盾艰难的过程中表现出无私的动人力量。作品在报告某些河水污染危害时不避尖锐，如沿淮流域的“癌症村”，在面对不少地方自觉牺牲行动时常常动情，从而使很多似乎政策性的举措带有了人性和情感的成分，也很好地体现了在落实“南水北调”这个大的惠民工程中以人为本，以大局为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自觉促进文明的努力。

这部报告文学，在人的无奈中书写人的豪情壮志，在艰难调水的过程中表现人们的无私奉献和大局精神，在尽可能接近科学的规划、调度、管理、要求中书写组织建设者的目标理想追求，在很多可能会危害调水目的的严重污染对象描述中提醒人们防止灾难发生等，既是对调水工程真实的报告，也是对所有以不同的方式行为参与这项工程的人们报告，还是作家自己在这次报告过程中丰富知识积累和复杂感受的报告，有身在其中又置身事外的眼光和把握，很见心力功夫与真诚态度。

“南水北调”是注定会影响久远的人造工程。对于这样的对象，有时真实记录社会重大事件人物的报告文学，是不应该忽略和错过的。喬兆宏不避采访过程的繁重艰难，不避真实表达的限制约束，甘愿投身期间，并获得很好结果。这在现实的报告文学创作和喬兆宏个人的人生及文学创作经历中，都是应当提倡和鼓励的。也许在写作中作者述事甚多，而突出人的行为及精神情感命运的笔墨显弱，文学感染力也许会受到影响。但是，作为重大的事件报告，因为有了这部《美丽中国样本》，“南水北调”这样的人类宏伟工程，方在大量浩繁的工程建设档案资料之外，有了一部更多文学特点而又简练易读的真实报告，这对于所有参与决策、领导、建设、管理和很多作出了无私贡献和牺牲的人们的心血劳动付出，对于包含在这些行为中的智慧、豪情、高尚精神、坚毅性格、复杂情感、命运际遇等丰富内容，是一次很好的检阅记录。这种“史志”式的文学书写，会成为历史和文学的一个部分，并伴随“南水北调”工程而保留，甚至其生命价值还会长久于工程本身、墨写的文字，比雕刻在石头上的痕迹还难以抹去。

作家忽培元不但在现实生活中追求诗意人生，而且积极捕捉现实生活的诗意。忽培元的不少散文就是这种捕捉现实生活的诗意的产物。忽培元在现实生活中追求诗意的人生与思考的人生的结合，而其散文则是诗意和哲理的有机结合，一些散文则达到了意深思远的艺术境界。

忽培元在散文创作上自觉地开掘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在散文《不老华山松》中，忽培元以华山松比喻仲勋等真正的革命家，热情讴歌了这些革命家的华山松品格。“在中国的名山之中，以松著称的似乎惟有南方的黄山。其实西北的华山松也是值得赞美的。它是峻拔向上的，主干坚挺笔直，经霜沐雨的树皮，像龙鳞一般斑驳而粗粝，透出无比的坚强与无尽的勇力。华山松的枝叶，不是在云蒸霞蔚中勃发的，而是在疾风烈日中生长的，当代人类文明面临的缺陷和弊病。在《“精神荒漠化”不容忽视》中，他不但指出了当代人类遭受着另一种生态失衡的威胁，即精神的堕落及历史传承的断流，而且深刻地批判了人类的“执迷不悟”。在《关于精神“缺钙”》中，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当代社会不少中高级官员在精神上严重“缺钙”，并指出这种精神“缺钙”说到底还是“骨头太软”。这些精神荒漠化和精神“缺钙”无疑是中国当代有些人在躲避崇高中对民族精神的消解。可见，忽培元的散文不是炫才扬己，不是无病呻吟，不是自我慰藉，不是谋取稻粱，而是自觉地对崇高民族精神的重铸。

忽培元的一些散文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这些哲理大多不是抽象的，而是和诗意有机融合的，犹如盐溶于水，浑然一体。在《“秤杆上较量，应该休矣”中，他提醒人们切忌在秤杆上较量，认为

2013年10月30日 星期三

民族精神的重铸

——忽培元散文印象 □石 慧

“世间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分量。只是有的人分量本来很重，却显得不重要了；而有的人分量原本并不重，却是显得很重。”“无足轻重”和“举足轻重”这两个成语并不能真正反映人生的本质。忽培元透过生活的泡沫看到了生活的真相。在《灵魂的救赎》中，他敏锐地看到了体制化对人的扭曲和异化，因而他追求人的自由与尊严，反对体制化，提出了灵魂的救赎。“生活则是不分青红皂白，统统以‘文明秩序’的借口，把我们每个人都投入了看不见却远比看得见的高墙还要坚固的‘牢狱’之中。我们作茧自缚，从此开始了‘终身监禁’的苦役。渐渐地，你在坚不可摧的运行机制中变得麻木不仁，以致远离希望，失去理想奋进、独立思考的勇气，而学会忍耐、接受，就范和适应，甚至完全忘记上帝赋予自己生命的价值：自由与尊严。”

忽培元的不少散文是写当代作家艺术家的。这些散文大多言简意赅，寥寥数语就勾勒出那些当代作家艺术家独特的艺术风貌和艺术特色。从中可以看出，他是深谙艺术规律的。他不但善于刻画作家艺术家的音容笑貌，而且善于把握作家艺术家的总体特征。在《纪念孙犁》中，他从总体上比较了中国作家孙犁与德国作家卡夫卡的同与不同，认为孙犁虽然感知到了常人无法感知的那些痛苦，甚至升至毁灭人类自身的逆流和潜流的存在，但却把那刺穿心灵的痛苦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田，而高唱出理想的颂歌。而在《致迟子建》中，他对迟子建的文学创作的感受是深刻而深刻的。他认为一个人的坚强，往往体现在她的脆弱时。人在遭受命运的不公待遇时往往会在痛苦不堪、伤心落泪，而在落着泪的时候又忘记做着生活下去的努力，这才是值得敬重的坚强。在迟子建的作品之中充满了这样的逻辑。这是迟子建小说中最为感人的一种贯穿始终的力量。可以说，忽培元这些赏艺品文的作品极大地弘扬了中国传统的解味文艺批评。在这些散文中他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在《黑土沃野上的不朽丰碑》中，忽培元认为中国当代文艺界有两种现象值得研究，一种是作家名气很大，但作品质量并不见得多高；一种是在社会上的名气并不大，作品却是质量高、数量多，件件堪称佳作。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奇怪现象。忽培元尖锐地批判了中国当代文艺界这种现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承担的责任，这就是真正优秀的文艺批评家不是随波逐流、俯仰随人，而是拨乱反正，明辨是非美丑，重新勘察、发现和评判真正有生命的艺术。

言说的女人与女人的言说

——读李美皆《说吧，女人》 □赵学成

我听到的最耸人听闻的女权主义宣言是，“女人不需要男人就像鱼儿不需要自行车一样”，据说它出自上世纪70年代法国的女权运动者之口。这种极端偏执的言论，很可能出于一种绝望而又愤怒的“撒娇”心态，因为她们面对的是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事实上，时至今日，无论是在单纯的理论和文化意义上，还是落实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女权主义都很不受待见。这一方面固然源于女权主义者自身的弊病和弱点，但更深层的原因，毫无疑问是男性主导下的文化心理的顽固与惰性。

在这一文化情势和背景下，李美皆的《说吧，女人》(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6月版)一书闯入了我们的视野。书名道出了作者立场和态度。无疑，这是一位女性作家面向整个男性文明的“无物之阵”而发出的新的宣战，也是一位带有启蒙意味的知识分子朝向所有女性的一种理性呼吁，这更是作者在 its 独特的女性主义理念指引下，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做出的一种生动的话语实践。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在各种理论话语的竞逐与博弈中，在男权文化长期的压制与贬斥下，对于女性来说，言说就是权力，就是对主体的占有、守持和证明。此书开篇文章为《“简·爱”的非女权主义解读》。众所周知，《简·爱》被普遍视为女性自尊自强、奋斗成长的励志传奇，更成为女权主义话语建构的源泉和例证。而李美皆在一本颇具女性主义色彩的书中却对《简·爱》进行了“非女权主义解读”，通过文本细读，彻底解构了传统阅读形成在简·爱身上的那种僵死的、模式化的主题认知，将一个女性成长的励志传奇还原为一个世俗的、乃至有些庸俗的爱情故事，也颠覆了简·爱作为一个高大完美、独立自强的经典女性形象，剥除了她身上被人为附加上去的人格光彩，由此反驳和纠正了传统女权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外误之处，从而为一种客观的、平和的、务实的、辩证的女性主义奠基和张目。李美皆在此不假重新发现了《简·爱》这一著名的文本，重塑了简·爱这一承载了太多女权主义隐喻和象征的女性形象，也扭转了长期以来存在于女权主义理论建构过程中的那种囫圇枣实、凌空蹈虚的错误倾向。我以为，还原一个真实的简·爱固然意义殊大，但这是最后一点却是李美皆此文主旨的落脚点，它以批判的视角和方式给女权主义治病，重申了正视事实、客观公正的批评伦理，反而为女权主义打开了一扇通向真理和未来的窄门。

《风情万种，为谁花间暗断肠》从文化和人性的角度来审视和探讨女性。它由电影《金陵十三钗》对妓女的表现说开，参照相关史实、典籍和其他同类电影，结合严歌苓的同名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指出无论是“非典型妓女”，还是“女学生”，都隶属于一种男权(文人)对女性的文化想象。文章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结合小说和电影的细节，犀利指斥了包括宗教在内的所谓“文明人”的悖谬和虚伪，深入骨髓的文化偏见甚至左右了他们对妓女生命价值的潜在判断。以此为契机，李美皆还对历史上的妓女现象和中国传统文人的妓女情结，作了考古式的梳理和研究，其中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和深刻的见识。整篇文章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终点固然美妙，路上的风景亦是动人。

《法国出了个波伏瓦》回顾了波伏瓦充满传奇的一生，重点凸显了波伏瓦在性别身份的自我认同上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辨析了其在历史脉络中“不可没有，也不可多有”的地位和价值。《两生花：丁玲与波伏瓦》用“两生花”形容丁玲和波伏瓦这两位20世纪最杰出的女性，以双线并行而又交织的叙述方式，再现了两人在不同历史境遇中的人生抉择和经历，具有一种历史的深度。《万转千回，爱过之后》以《小团圆》和《今生今世》为契机，复现了张爱玲和罗兰成盘根错节、欲理还乱的情感纠葛，深入剖析了张、胡二人特别是张爱玲的文化人格构成和心理纹路，使我们切近了一个裹挟在情感漩涡中不能自己的张爱玲。《时间流逝了，她依然在这里》通过对与陈染交往过程和细节的记述，为我们摹画出了一个当代女性(不只是女作家)的生活情态和心灵面影，她在喧嚣的时代现实面前的清静自守，和她个性中的敏感自尊、谨慎冷静一道，作为一种自生的选择，不啻为一幅风格化的、关乎自我存在的女性画像。

李美皆的文字风格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她能轻易地将细碎的观察、日常的生活领悟和深刻的睿智总结起来，糅合为一种活力很强的叙事。这种叙事既不同于一般学理化文学评论，也不同于那种兴之所至，如水漫溢的文化随笔，而是吸纳两者之长，规避两者之短，综合重组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体。它既理性又感性，既智识又抒情，既批部导察又饱和松弛，同时保留了逻辑的周密、生活的质感和口语的鲜活，是一种有力量、有体温的话语方式。李美皆非常善于在细微处发现线索和问题，同时保持着一种探究竟的热情和耐心，并勇于作出果决的判断，在细节编织和整体布局上有着很好的平衡感和方向感，使她的叙事充满了让人着迷的奇特魅力。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叙事魅力，加上她客观公正的态度，使作为男性读者的我，可以不带任何戒备和偏见的沉潜其中，并且心悦诚服。

拯救与抗拒

——读中篇小说《风止步》 □喻向午

剧烈冲突，注定了小说悲剧性的结果。

作者还塑造了一个次要人物马秃子。这个角色起到了测试王美花忍受能力的作用，是小说的另一个亮点。马秃子是个乡村流氓，他强占了王美花的肉体，还反反复复敲诈钱财。更重要的是，马秃子就是性侵燕燕的恶棍。这一切，王美花都咬牙忍受了，只为马秃子能继续保守性侵燕燕和霸占她的秘密。她要捂住这个秘密，不容任何第三者触碰。从这一点来说，王美花有着惊人的忍受能力，只要不跨越她的“底线”。而吴丁试图说服王美花指认施暴者，这无异于将她的家族屈辱的秘密公之于众。这个秘密散布开来，将摧毁她最后的精神防线。

王美花把孙女燕燕的“清白”看得比她的命还重要。保守这个秘密是原则性的问题，没有退让的余地，哪怕付出任何代价。

吴丁的所作所为应该说也有强大的精神支撑。他本人就是性侵的间接受害者。他从前的恋人被人强暴，愤怒的吴丁向警方报案，因为他这一冲动的举动，导致了恋人的跳楼自杀。而他现在的女友左小青，也曾遭受性侵犯。他有切肤之痛。这就是他四处寻找性侵犯者，并力图说服受害者将不法之徒送上法庭的最原始动因。

作者这样设置两个主要人物，小说的戏剧性和强烈的人物冲突也就水到渠

成。这也是小说的独到之处。

为了打击性侵犯者，吴丁的所作所为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他筹钱给逝去的恋人买墓地，因此买断了工龄。他还动员现任女友左小青也站出来举证性侵犯者。在他看来，遭受了性侵犯没有必要保持沉默，“这没什么可耻，隐忍那才可耻”。但左小青并不愿意提及以前的痛处，她极力回避，认为这并不是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吴丁坚持己见，左小青最后也离他而去。

在找到王美花的时候，吴丁几乎走到了穷途末路。但他又是一个倔强的战士，坚强、锲而不舍，虽然他从不被人理解和支持。他成立了“正义联盟”QQ群，通过网络的力量揪出侵犯女性的施暴者。也是通过网络，吴丁知道了王美花的孙女燕燕遭到了性侵。与王美花的几次交锋，他显得有些笨拙，没有任何策略，更没有胜算的可能。

就在吴丁看不到希望，萌生退意的时候，警官给他打电话，一个性侵的恶魔落网了，他的落网与吴丁有关，是吴丁说服受害人报的案。“许警官的电话又将吴丁的信心点燃”。王美花为了送走这个“瘟神”，各种方式无所不用其极，如果吴丁还不放弃，那就只有一个结果：鱼死网破。

吴丁住到了王美花所在的镇上，连吃饭都成问题。这个饥饿的拯救者，在吃

完被“拯救者”为他炒的一碗放了农药的米饭之后，痛苦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小说结尾也由此蒙上了浓郁的悲剧色彩。

这几乎就是一个荒诞的命案。之所以荒诞，是因为两个社会身份如此迥异的人，怎么也不可能牵扯到一起。他们对待对方的身份信息一无所知，甚至叫不出彼此的姓名。但命案就这样发生了。

《风止步》的人物形象极富张力，让读者从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也让阅读变成了一次历险。小说所营造出的艺术真实性并没有让读者获得如沐春风的阅读感觉，而是对人物揪心的、耿耿于怀的感受。

吴丁和王美花两个人都是性侵的直接或者间接受害者。两个受害者的对抗，让读者陷入情感上的纠结。吴丁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个堂·吉珂德式的“战士”，从这个层面上说，他是令人敬佩的。但他不依不饶的“拯救”行为，又令受害者厌恶。那个死掉了有着善良心和正义感、值得同情的落魄青年的农村妇人王美花呢，她应该是在被同情的弱者，还是被挞伐的对象?她的所作所为是迫不得已，还是顽固的封建思想作祟?即便是思想顽固，那让这个受害者，这个老弱的农妇走出这罪恶简单的罪魁祸首又是谁呢！

小说简单的人物关系呈现了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结论式的评判对作品中的人物基本行不通。小说中的人物都有自己的生活逻辑，而且都有强大的理由支撑他们的行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所有的抗拒都毫无道理，并不是所有的拯救都受到欢迎，就像没有绝对的真理一样。

饱含激情的诗性书写

——读报告文学《一枚铺路的石子》 □袁学骏

的情景，在茶场仓库里“闻着书香吸着茶香”的感受。北川是民族自治县，他学吹羌笛唱羌歌，主抓卷帙浩繁的县档案馆修复。在档案的转运仪式上，兰辉忘记了自己是副县长，不禁跳起了羌族舞蹈。档案中有兰辉1993年担任共青团县委副书记时的一封信，其中写道：“对利益的得与失，希望能保持一种静的心境。不以得而狂喜，不失而忧悲……黄金无论埋多久永远是黄金。”这是他的工作方法是从“从旁提醒”。他自勉“誉中静，讽里静”，6个字展示出他荣辱不惊的处世理念和淡泊情怀。后来兰辉分管安全生市监督和交通，本来他对这些一窍不通，但他买书读书，很快实现了成功的转身。“暮色又燃，浑身苍苍，手提夕阳，诗重重光山……”这是他写给筑路工人的诗，也是他深切的生命体验与形象写照。兰辉就是在带病巡视重重大山、做了各种提醒和现场办公后，疲劳过度而坠下悬崖的。

作者还向我们讲述了兰辉那些凡俗而又不凡的故事，再现着兰辉琐碎而又气度可嘉的日常工作态度。他从来不怕上访，总是真心实地地为乡亲们解决困

难。一天，兰县长要白果村村民母军贤带路，对服务人员称他是“我的客人”。这是一种平等的交往。他遇见在雨中号啕大哭的女老板李堂会，便“撑开雨伞，递到她的手中”，细心的抚慰让她从遭受洪灾的打击中重新站了起来。他帮助残疾儿童朱康义，让他第一次听到了世界上的鸟鸣。王诗山的家在新筑的大路旁，兰辉考虑到他常年坐轮椅不方便，便召集施工人员进行为老人铺设了通道。“这条通道是一条有形的‘兰辉小道’，让人性的温度畅行无阻；而有太多无形的‘兰辉小道’，直抵百姓心间，让人间的爱意如花绽放。”因为兰辉深知，“得到信任不容易，要失去信任在瞬间”。所以，“他不敢懈怠，始终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兰辉把百姓的呼声视为命令，把百姓的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

“心中有大义才会有大作品，手上有巧笔才会有好文章。”这是刘奇葆同志在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讲的一句真言。《一枚铺路的石子》既有传统的党性意识、民族精神、文化底蕴，更富有崭新的时代特征。作者以自己心中之大